

试论绅权

郝秉键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gent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basis of gentry power and how it came into being. The birth of the gentry authorities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following factors. First, the state power could not extend its authority to the grass-roots of society. Second, the gentry owned most social resources. The gentry ruled local society through lineage organizations, the magistrates, the private secretaries, the clerks, the runners, and the bao jia organization they controlled local areas.

明清时期,绅士在国家、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但主宰着广大民众的社会生活,担负着连络官民、排难解纷、劝善举业、移风易俗等多种社会职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地方政局,并构成“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早在40年代,吴晗、费孝通等人曾围绕绅权与皇权的关系探讨了绅权的社会特质,本文则试图转换一个视角,从绅权的生成及其社会构成来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

一、绅权的生成

基于“多元的结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所谓二元社会控制体系^①,即国家一方面依靠职业官僚集团来维持全国大一统政权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又通过凌驾于基层社会之上的地方势力集团来控制广大村民百姓。该地方势力集团在汉代为豪族、在六朝隋唐为士族、在宋代为形势户、在明清为绅士,其间虽有种种差异,然却一脉相通。耐人寻味的是,作为行政机器的推动者,职业官僚集团的权力是由国家或君主授予的,而游离于正式行政系统之外的绅士,其权力到底是如何获得的呢?或者说,绅士是如何取得对地方的控制权的呢?

1. 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低度渗透为绅士统治提供了空间。秦汉以降,中国形成以君主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体制,即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家产官僚制。这一体制虽然具有制度结构上的优点,但对基层社会的统辖力却比较微弱。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国家行政系统只延伸到州县一级,至于州县以下广大乡里社会,尽管历代设有里社、保甲之类的乡治组织,但并非正式行政机构,实际效果也不理想。以清代言之,朝廷虽一再明示严行保甲,“以消弭盗贼奸匪、稽核户口”,然在推行过程中,地方官往往奉行不力,视为具文,“即有行者,亦不过于城厢内外,聊造一册,有总户之名,而无丁口细数,与不行等”^②。康熙四十七年(1708),曾一度整饬保甲,但时隔不久,又成为“故事”,以致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再

度诫敕：“弭盗之法，莫良于保甲，乃地方官谄其烦难，视为故套，奉行不实，稽查不严；又有藉称村落畸零难编排甲，至各边省更藉称土苗杂处，不便比照内地者，此甚不然！”^③特别是自乾隆中后期，里甲、保甲组织的功能更陷于无形，其职能日渐为宗族组织或社会共同体组织取代。

其次，担负“亲民”之责的州县衙门，无力独当地方政务。有人统计，中国的人口由汉朝的六千万人增至二十世纪初的四亿人，但州县的数目并没有相应增设，大约保持在 1200—1385 个之间^④；而如此庞大的人口在清代大约分布在七十万甚至一百万个村庄中^⑤。如是，清末每个州县大约平均管辖二十多万人、五百多个村庄。与这一广土众民的社会格局不相对称的是，州县衙门的官员配备很不完备。以清代为例，每个州县仅设正印官一人，举凡政令、赋役、治讼、教化、风俗等事，皆须“躬亲厥职而勤理之”。每个州县虽配有佐贰官来辅佐政务，但因事增减，并无实权，形同虚设。《大清会典》卷五载：知县 1303 人，佐贰官 400 人。也就是说，全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县没有佐贰官。如此体制自然无法承载州县之繁复的行政事务，于是不得不使统治机器浮在社会的上面，而置基层社会于“天高皇帝远”的状态下。就政府与百姓的关系而言，一般只在赋税力役等公课征收时，才有接触，政府的施政行为基本被排除在农民的生产、生活过程之外。就官员而言，只须在衙门办事则可，至于下乡干涉，乃是万不得已的手段，且应尽量避免。清人汪辉祖曾告诫州县官：“衙门中事可结便结，情节之无大关系者，不必深求，往往恃其明察，一丝不肯放过，则枝节横生，累人无已”^⑥，反对官府过分介入民事冲突。就民而言，以“官事少”，能避免见官为安居乐业的理想。因此，皇权虽在理论上具有通天彻地的能力，但实际上“在官府看不上眼的平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却只是一个象征”^⑦。基层社会这种权力“空虚”状态就为绅权的发生提供了生存空间。

2. 绅士自身所占有的资源优势及乡里社会所需是绅权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德·布劳指出：权力就是“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其生成的基本条件一是“对资源的垄断”，二是“提供必要的利益”^⑧。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即可找到绅士的权力支点。

第一，绅士对资源的垄断。

所谓资源，是指整个社会所拥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财富及各种社会关系的总称。在政治上，绅士不仅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特权，如“自由见官”之权、法律优待权等^⑨，而且独占了以官僚机器为后盾的强制性政治资本。因为绅士一方面以其政治社会身份（或为离职、退休之官僚，或为官僚队伍之后续成员）为纽带与官僚机器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又以科举、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亲情关系网，即“科举的同榜构成师生和同年的政治关系，同一乡里则又构成同乡关系”。凭借这些关系，绅士不但可以对乡民实行超经济强制，甚至可以控制地方守令，“使其顾惜前途不敢加以钤制。尤其是父兄或子弟在朝的乡绅，更是势焰熏赫，奴使守令，成为地方政府的太上政权”^⑩。江苏昆山巨宦徐乾学兄弟，“一门十五贵”，“亲戚、故旧、门生遍于天下”，子侄姻亲倚势玩法，鱼肉乡民。地保畏其威势而不敢举报，州县逢迎势要而沉搁不究，府院碍于情面而加以回护，致使小民“血词四奏”而不得申冤^⑪。因此，时有“杀民莫恶于显宦，显宦之恶莫甚于昆山”之说。古语所谓“宁负二千石，不负豪大家”，正可以概括绅士对地方的政治威慑力。

在经济上，绅士虽不等于地主、富商，但因绅士占有雄厚的政治资本，而“在农业社会，用政治权力获取财富比用财富去获取权力来得更容易”^⑫，所以对经济财富的占有量必占绝对优势。张仲礼估算 19 世纪中国绅士的年收入总量为 6.45 亿两银子^⑬，而其人口（包括家属成

员)约720万,约占总人口2%。如是,绅士集团的年人均收入约90两。有人估计,18世纪中晚期,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大约4500—5000万两银子(不包括地方、省政府留用的额外附加税收)^⑩;即使在清代最繁盛的中期,政府全部财政收入也没有超过全国谷物产值的5—6%^⑪。以此而计,当时全国谷物总产值大约8—9亿两银子,也就是说,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人均谷物产值大约2—3两银子,与绅士的收入相差甚大。马克思说:财富是“实力的证明”^⑫。绅士正是依靠经济优势,一方面以经济关系控制百姓,因为绅士中有一大批人是地主或商人、高利贷者;尽管清代有大量自耕农存在,但从全国范围看,仍有约50%的农户可定为佃农或半佃农^⑬,他们或与绅士结成租佃关系,或与绅士结成借贷关系,从而不得不依赖于绅士。另一方面,绅士可利用手中的财富打通官府,借官府之力来解决绅民冲突,并使官府的裁决有利于自己。

在文化上,经过长期职业化训练的绅士,几乎垄断了全部“文化资源”。因为文化学习需以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时间为前提,对于疲于生计的广大百姓来说,读书绝非一件易事,加之为官方所认可的经典文学,不但其内容难于理解,就是文字本身也因文言相异及象形方块字体的局限而难于掌握,所以只能是一字不识或识字不多的“愚民”。中国文字和文化“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而不仅是一种社会工具”^⑭。具有文化学识不仅表明一个人有了认识和进入社会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由此显示出特殊的社会地位。具有文化知识的绅士,不仅熟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被人们看作是规范的解释者和象征,而且可以进入上层社会,其他人要在诉讼、契约、请愿等公共事务方面求助于他们。于是,绅士就因“文化”而获得他人的膺服敬重,而权力也就从他人的膺服敬重中产生。正如弗兰兹·迈克尔所说:“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绅士所受的是这种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⑮。吕坤在《居官必要》卷一中即描述了绅士以“读书知礼”服人的情形:“吾少时乡居,见闾阎父老、小民同席聚饮,恣其笑谈,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唯秀才之容是观,唯秀才之言语是听;即有狂态邪言,亦相与窃笑而不敢言短长。秀才摇摆行于市,两巷人无不注目视之曰:此某斋长也。人情之重士一如此,岂畏其威力哉!以为彼读书知礼之人,我辈村粗鄙俗,为其所笑耳。”

与上述因素相关,声望也是绅士的权力支点。声望是由于人的特殊地位和才能而获得他人尊敬和服从的一种资源。与建立在物质财富基础上的经济权力和强制性的政治权力不同,声望以他人自觉尊敬和服从为条件。由于绅士身份由“天子”命定,而“天子”在百姓眼中具有超自然的神秘性,因而绅士也取得“神”的性格。“在民众的眼里,一个通过考试的候选人,绝对不仅仅只是个在知识上够资格做官的人,他已证明拥有神奇的特征”^⑯,正如《儒林外史》中胡屠户所说:“这些老爷都是天上的文曲星”。在“神”的面前,民众自然会产生遵从心理,加之绅士们在乡里又常常能发挥“乐善好施”、“和睦乡党”等多种社会功能,所以更加强了这种心理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感召力,其一言一行,均可为乡民法则。《居官圭臬》云:“大凡一方有一个乡绅,便为那一方的表范。乡绅家好刻薄,那一方都学的刻薄;乡绅家好势利,那一方都学得势利了。若还有一个乡绅俭朴淳笃、谦虚好礼、尊贤下士、凡事让人,那一方中,那个不敬重他、仰慕他。”^⑰这正道出了乡民对绅士的遵从、效法心理。

第二,绅士可提供“必要的利益”。

彼德·布劳说:“提供必要的利益(没有这些利益,其他人就不容易行事)无疑是获得权力的

最普遍的方法……为其公民提供必要保护的政府,为其雇员提供必要工作的雇主以及为社会提供必要服务的职业,都使其他人依赖于他们并潜在地服从于他们的权力”^②。那么,绅士到底为其社会提供了哪些“利益”而使民众服从于他们的权力呢?

首先,绅士可充当乡民的“代言人”,遇事与官府交涉。如前所述,由于政治经济结构的制约,广大基层社会处于“天高皇帝远”的状态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乡民被完全置于“王化”之外,因为他们除了在赋役、诉讼等问题上与政府打交道,还有许多社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得不诉诸官府。然而,在官民隔绝的传统社会结构下,普通乡民并不具备与官府交涉的资格、能力,因而需要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言人,而绅士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正好扮演了这一角色。一方面,绅士在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过重时,出面反映民意,与官府论争。例如:顺治年间,湖南攸县“役杂派,浮于正供”,士民不堪其苦,庠生刘某“鸣之当道,革除站夫……里民始苏”。道光年间,攸县欠收,士民因拖欠钱粮而被知州惩治,举人欧阳氏“与有旧,反复辩白,遂获免”^③。

一般说来,由于绅士与本乡民众有共同利益,因而也乐于充当其“代言人”,并尽力维护本乡本土的利益,“一个乡绅不会无情地剥削他的同乡,相反,他经常要尽最大的努力为当地群众说话”。另一方面,绅士代表乡族出面吁请政府解决社区内的冲突或举办各种公益事业。康熙年间,浙江余姚县中河、高桥、千孟等村因“晚禾需水”,盗决上虞县夹堰,引起水利纠纷。上虞绅士赴县请求行政干预,最后经两县知县协商,使水利冲突得以解决。福建泉州晋江薛氏宗族在嘉庆年间与郑氏宗族发生摩擦,二族均公举本族绅士负责与官府交涉,控告对方。

其次,绅士充当乡民的“保护伞”。一般说来,乡民主要有两项要求:土地和安宁,而实现这两项要求的最大障碍是“人祸”和“天灾”。人祸主要来自专制“政治老虎”,一旦专制压迫发展到难以承受时,农民一般采取两种反抗方式,即起义和逃避。前者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发生,后者才是比较普遍的行为选择。那么,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格局中,小民到底能逃到何方呢?答案自然是绅士。因为绅士享有“优免权”,具有较强的政治免役力。明代,绅士享有很大的优免权,一个绅士不仅可免纳一定数量的田粮,而且享有不止一人的免纳丁税的份额。清初,各项政策多承明制,顺治五年颁行的《官儒户优免则例》即完全照抄了嘉靖二十四年的优免条例。后来清政府虽然废止了这一则例,不许绅士免纳田赋,但仍保留了绅士本人免纳丁税之权。“推丁入亩”后,绅士免纳丁税之权虽在理论上消失于地税之中,实际上仍保持效力,况且优免权只是绅士获得政治免役力的因素之一。此外,绅士还享有法内的拖欠权,拥有法外的抗欠、偷漏赋税能力。清制规定:凡贡监生员,如不能按期纳税,均可宽限完纳^④。这种延期纳税法显然可以增强绅士的“免役力”,但绅士并未因此而满足,实际上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身份,要么公开抗欠,要么巧立“绅户”、“儒户”等名目将自己的钱粮转嫁到“民户”、“小户”头上。广东潮阳绅士“素有健逋之癖”,蓝鼎元知潮阳时,绅士赵佳璧等人拒纳钱粮,甚至公然发动族人,关闭寨门,明示抗拒^⑤。生员郭向高之弟及族人拖欠归官寺租,该生“倡言仍归寺交官必致重纳,令将所欠租谷交伊代完,如有差催,伊自料理。随包收寺租,抗不完纳”。官府发差催比,郭向高竟敢殴伤差役^⑥。在吴江县,绅户完粮有所谓“倒八折”之说,即名下完漕一石,而只交米八斗,余者转嫁于小户身上。道光二十六年柏葭奏:江苏向来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⑦。因此,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负担,小农往往甘愿以“投献”、“诡寄”等方式将田产隐托于绅士名下,甚或投身为仆。顾炎武曾描述这一现象:“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⑧

与“人祸”相比,天灾更险不可测。由于“中国的降雨跟印度一样,都是由随着季节而变化着的季风带来的”,因此不但地区降雨分布不均,而且在年际间降雨量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使“水分供应的自然过程对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来说,不仅是不可靠的,而且的确是灾难性的”^②。在此条件下,任何较大气候波动,“都可能导致很大的灾难,甚至是范围广泛的饥馑”。与这种多变性气候不相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经济。这种经济方式十分脆弱,一旦发生水旱灾害,轻则地尽抛荒,重则家破人亡。因此,对小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水利”和“赈济”。

多年来,人们一直比较注重“治水的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③。其实,如果从基层社会看,很大一部分“水利”乃至各种公益事业倒是在绅士等地方实力派的领导下由乡族共同体自行组织,并不需要国家的干预。在各地地方志中“义行”、“孝友”等项下,关于绅士捐资兴建水利工程、建置义田义仓、修筑桥渡路井等造福乡民的“义举”的记载不胜枚举。据统计,乾隆至光绪年间,广东共建义仓 53 所(有建置者身份的 47 所),其中 35 所由绅士倡办或参与倡办,4 所由知县、知府、团练倡办,分别占有建置者身份总数的 74% 和 8.5%^④。据张仲礼对《惠州府志》、《容县志》中有关修建桥梁、津渡人员身份的统计,两地共建桥梁 200 座,其中绅修 86 座,占 43%;官修 13 座,占 6.5%;官绅合修 3 座,占 1.5%;民修 50 座,占 25%;余者不明修建者身份。共建津渡 94 处,其中绅修 22 处,占 23%;民修 26 处,占 27.66%;官修及官绅合修 2 处,占 2.13%;余者不明建置者身份^⑤。

诚然,绅士向村民百姓提供的利益不止于此,但可以肯定,由于绅士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而掌握了“水利”、“赈济”等公益事业的兴办之权,并为乡民提供了政府不能提供而他们自己又不可缺少的“利益”,所以作为回报,他们就对绅士产生“亲切感”,所谓“民之信官不若信士”;就要依从绅士而行,所谓“凡地方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之兴废”。权力于是从中产生,这正是布劳所说的:“权力依赖于人们对于当权者不得不拿出来的利益的需要”^⑥。

总之,绅权主要基于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低度渗透和绅士自身所占据的资源优势及基层社会所需。因此,绅士统治要受国家、绅士、社会三者矛盾关系的制约。只要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只要绅士对民众的统制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国家与绅士、绅士与民众就不会发生大的冲突,绅权即可处于理想的状态之下,传统社会的“秩序与和平”就有了保障。

二、绅权的社会结构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安东尼·M·奥勒姆指出:权力是指“作为有约束力的决策的社会能力”,它不但受“范围”、“资源”、“分布”等量的因素的制约,而且与社会成员间权力分布的深层特性即权力结构有关^⑦。长期以来,人们在考察绅权时,比较注重绅权的权限和绅权与皇权的关系,至于绅权如何向社会辐射、绅权的深层结构如何,则论之较少。“权力结构是一个涉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概念。社会中的当权者通过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并行使权力”^⑧。那么,绅士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来对地方行使权力的呢?

1. 宗族、姻戚 宗族是指分居异财而又认同于同一祖先的亲属团体或拟制的亲属团体。在“家天下”的社会格局下,作为同一祖先的子孙,绅士虽贵为“皇帝家人了”,但也跳不出宗法

关系的网络,既要承担宗族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又要借助宗族力量取得功名,并完成代际流动,“有力的宗族”,往往成为“乡绅辈出的母胎”。如福建连城新泉望族张氏在清代竟有 800 多名族人获得科举功名及荣誉职衔^⑧。安徽桐城宦族张氏,自张英崛起后,“文章甲等,笼蹕一时”,在其五个儿子的后代中,五代之内竟有 146 人获得功名,占 82%^⑨。同时,作为“四民之首”,绅士无疑是宗族内的“贵”者,拥有支配族政的特权。一族之族正、族长、族副往往由绅士担任或由绅士控制,所谓“族正以贵贵为主,先进士,次举贡、生监”。如是,绅士与宗族就结成这样一种关系:绅士依托于宗族取得身份、权力,形成权威后又超越宗族,形成个人权威。这种交换关系不仅扩张了宗族势力,而且延展了绅权,并使绅权、族权紧密结合起来,宗族成为绅士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

在清代文献中,有关绅士操纵族众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记载俯首可拾。广东潮阳赵氏宗族,“衣冠之士,济济数十”,逋赋抗粮,相沿成习。县令蓝鼎元多次发差追比,一无所获,最后只好请兵弹压。岂料该族绅士赵佳璧等人发动族众闭门抗拒,“寨内刀枪林立,锋芒闪闪,露出墙头,高声言曰:‘我等抗粮细故,殴差夺犯是实,任汝通详千万绪,寨门总是不开,谁敢环攻而入,与我决一死战乎?’冯尉见其顽凶已甚,无悔罪畏法之心,亦无可如何”^⑩。有些绅士为了牟取私利,还不惜操纵族众,发动械斗。徐康陛一语道破:“大斗之案,连乡百十村,聚众数万人。问其起衅之由,实无难堪之事,不过一二刁衿劣监,逞其桀骜,鼓煽愚民而逞忿营私,敛钱济欲”^⑪。历时五年、伤毙四十四命的广东海阳林、孙二姓械斗大案中,林姓族衿林哲即主持纠敛斗费,前后派得米银九千二百圆^⑫。对族众来说,由于绅士是一族之“贵”,家族兴衰每以绅士为转移,所以一般也乐于服从绅士指挥,甚至不惜冒犯王法为绅士效命。姚莹指出:“漳俗族姓大小强弱之分最明,小役大,弱役强,由来已久。缙绅之强大者,平素指挥其族人皆如奴隶,而性畏见官,有事则匿不出,或阴使其族人为诸不法,愚民不知畏官,惟畏若辈,莫不听其驱使”^⑬。

绅权的扩张不仅依赖于宗族,而且依赖于以“姻戚”关系联系起来的绅士家族网络。反观中国古代社会,联姻通常是特权阶级维持其既有地位的重要方式。“王、谢高门非偶”、“崔俊一门婚姻皆是衣冠之类”,就是昔日“士族”婚姻状况的真实写照。清代地方望族虽不是“一门婚姻皆是衣冠”,但也十分讲究“门当户对”。江苏昆山巨族徐氏“一门十五贵”,子女多与宦家子弟为婚。以徐乾学为例,长子树谷娶翰林院编修叶廷玉之妹,次子徐炯娶河南学政庄潮生之女,四子树屏娶少詹事邵远平之女。此外,大学士陈元龙、张玉书、冯溥,户部尚书王鸿绪、翰林院侍读学士沈朝初、礼部尚书陈诜、刑部侍郎叶方霭、翰林院编修钱岐均与他有姻戚关系^⑭。安徽桐城宦族张氏、姚氏自姚孙裴、姚孙枢、张英诸公以科甲起家后,冠盖相望,子孙多人身列仕版。二族不但乡谊深厚,而且长期保持通婚关系。以张英后代为例,在其六子中,有三子娶姚氏女为妻;在孙辈中,有 71% 的男子娶姚氏女;在重孙辈中,有 42.5% 的男子娶姚氏女^⑮。这些数字只反映了张氏男子与姚氏女子的婚姻状况,如果将张氏女子与姚氏男子的婚姻关系计算之内,想必二家通婚次率更高。正是通过这种高频率的婚姻关系,张姚二氏结成一体,在地方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诚然,追求门当户对不只是显宦家庭的习尚,一般家庭也有此种偏好。以诸暨钟氏、上海曹氏为例,前者在 1651—1700 年、1701—1750 年两个时期,分别有 69.5% 和 55.6% 的生员的婚姻实现了门当户对^⑯;而后者在 1650 年以前、1651—1750 年、1751—1850 年、1851 年以后四个时期,具有生员以上学位的族人与具有学位的婚家的结婚比率分别为 23.5%、31.5%、32.5%、23.9%^⑰。

通过姻戚关系建立起来的家族网,加强了绅士对地方的控制。在某一社区,可能只有由若干有姻戚关系的大家族发挥主导作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不仅乡民畏之如虎,就连地方官也不得不退避三舍。

2. 州县官 州县为“亲民之官”,绅士为“一乡之望”,二者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临界线上,分别从不同的渠道,共同治理地方社会。因此,绅权的伸缩不可离乎州县官。

由于绅士统治只有皇权所赋予的“威”,不具有皇权下职业官僚系统的“权”,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不免缺乏强制性力量而不得不借助官府的支持。从公而言,绅士虽可以脱离官府,单独号令乡民举办一些小型公益事业。但在一些联乡跨界、耗资繁巨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设中,就不得不谋求官府出面支持或干预、认可。在松江府境内,河网密集,灌溉工程犬牙交错,各县必须通力合作,方能保证水道畅通。因此,绅士每欲兴办水利,往往首先禀官指示,然后由官府协调、划分各县的具体职责,最后在官府的监督下,由绅士组织完成。从地方志看,一大批地方公益事业都标明“绅士某某禀宪倡兴”之类的字样。这正可以说明绅士需要官府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需借官府之力强化自己的号召力。从私而言,绅士更需要仰仗州县官之力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道光年间,松江府土匪、流丐出没无常,严重威胁绅士地主的利益。因此,绅士王骏等人联名赴嘉定县呈请官府究治^④。山阳县佃农抗租斗争十分激烈,绅土地主无法控制这一局面,于是呈请知县干涉。知县支持他们的行动,在四乡发布告示,严禁佃户抗欠田租^⑤。尤其当绅士们肆虐乡里、荼毒乡民时,就更需要官府回护、包庇。徐乾学子侄占人田产、诈骗钱财,原告沈恣投诉县主,县主董某不畏功令,暗密打点,肆行包庇,“凡关徐府,无不竭力趋奉,致沈恣所控临审模糊,不容理直,反责家人,喝令逐出”。王胜时等人侵占民人诸又贞田产,诸又贞颠连上告,无奈官绅相护,“将军徇宦,中寝不究。府县畏权,民冤不问。犯不到官,赃不追究。东南黑暗,王法空悬”^⑥。

因此,绅士总是试图结交,甚或钳制州县官。对州县官来说,因绅士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一般不敢得罪他们,相反要依赖他们。首先,绅士左右着州县官的“官声”。“官之贤否,取决于绅士之论”,“官之毁誉多以若辈内转移”^⑦。如果某州县得到绅士拥戴,就可能获得社会好评,并取得好的“考绩”。山东长山县知县徐亭玉在任时,“设学校,劝农桑,议开河,请缓征,省刑簿”,受到绅士赞许,因此离任之时,“阖邑绅士赴省请留”^⑧。相反,如果某州县得罪绅士,就有可能自身难保。长沙县某副榜因该县王渭不准其承办祠宇工程,“辄藉该县因案戒飭生员,起意纠众呈递公禀,预谋阻考,冀将知县撤任”^⑨。因此,不少州县官为了抬高官声,常结交、嘱托地方绅士,为其广造声势。山西地方,每逢上官巡视,士子们即“称颂县令,遍帖歌谣”;更有“贪墨之吏,虑其覆败,伪开政绩,嘱托掇扬”,以求保留^⑩。有些地方,每逢上宪按临,即见“遍衢红帖,当署挂旗”,公开颂扬州县德政^⑪。《官场现形记》中“乞保留相意媚乡绅”一节即是对这种情况的反映。

其次,对州县官来说,绅士至少拥有如下三项政治社会资本,令其生畏。其一,绅士与乡民共居一地,或结成租佃关系,或有姻戚血缘关系,其社会基础远比“官如行马,仅一过耳”的州县官深厚,“盖官有更替,不如绅士之居处常亲”。在乡民眼中,绅士可能比官府更有威慑力。粤西乡民“畏乡绅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举人阎老、秀才尚书’之语。其畏官长也,不如畏绅士。故俗有‘官如河水流,绅衿石头在’之语”^⑫。因此,一旦州县官得罪绅士,绅士极易发动乡民,对抗官府。如宁都绅士李绍广、李瀛洲等人因县令催比钱粮而不快,“唆众罢市”^⑬。其二,绅士具有通天彻地的政治能量。这种能量一方面来自绅士的资历和特权,“因为乡官多半是显

宦，他的政治地位必然高于地方守令，举贡生员则为将来之显宦”；另一方面来自以地缘、学缘、血缘关系纽结起来的同乡、师生、同年、同宗关系网。其三，绅士，尤其是士子，是一个具有强烈“同类意识”的群体，一人受“屈”，百人之为之鸣不平，其势足以压服州县。嘉庆四年(1799)，吴县生员吴三新被债主杨敦原控告，知县甄辅廷未经申报革其功名，即行杖责，结果引起该县诸生罢考。两江总督采取强硬措施，圈禁、斥革生员多人，诸生更加不服，皇帝两次遣派大臣查处，惩戒知县才算了事^⑤。

因此，“地方有司则平日奉缙绅如父母，事缙绅若天帝，方依之以保官爵以求荐剡者也，安敢料虎须哉！故宁得罪于百姓，不敢得罪于缙绅”^⑥。尤其在清中后期，绅权高度膨胀，“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地方官不过为绅士“监印”而已！

3. 幕友与吏胥 在清代行政管理中，幕友和吏胥占有重要的地位。前者是地方官员聘请的私人顾问，举凡幕主应办事项，皆在其协理范围之内，甚而代行幕主职权；后者是各级衙门配置的公职人员，分别负责簿书期会、催征缉捕等内、外勤事务。二者虽然不具备“官”的名分，但具有左右官的能力。因此，在绅权向国家和社会辐射过程中，绅士总是力图控制这两个集团，并将其纳入绅权网络之内。

绅士对幕友的控制主要通过对该职业的渗透而实现的。“幕为专门名家之学”，尤其是掌管刑名、钱谷之事的幕友，无专门知识者绝难胜任。这一特点使清代产生了一门新的职业学科——幕学，也决定了幕友一职必须由知识者群体承担。因此，从幕友的构成看，“独占文字知识的绅士”必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⑦。那么，绅士为什么甘心从事这一职业呢？首先，入幕有较高的收入。据历史记载，乾隆初期，江浙诸州县之得力幕友，“非二三百金不得延至”^⑧。游幕多年的汪辉祖也提及，18世纪中叶，刑名、钱谷师爷“岁修之数”分别为260金和220金。至乾隆五十年(1785)，有至八百金者^⑨。与官僚豪富相比，这笔收入不算很高，然较之平民所得，也非一小的数字。自耕农姑且不论，即以下层绅士时常从事的另一职业——教馆言之，当时一个教师的年收入大约只有十几两、几十两不等^⑩。如是，对幕友来说，达到小康水平大体不成问题。汪辉祖曾不无惬意地说道：“吾辈从事于幕者，类皆章句之儒。为童子师，岁修不过数十金，幕修所入或数倍焉，或数十倍焉，未有不给于用者；且官有应酬之费，而幕无需索之人，犹待他求，夫何为者？”^⑪因此，倘若“读书无成”，“以幕疗贫”不失为一上乘的选择。

其次，幕业是一相对自由、受人敬重的职业。幕友不属于国家行政系统，与幕主是宾主关系，没有上下隶属关系。入幕不仅可享受“客礼”，而且来去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

再次，入幕可实现政治参与。从历史上看，“清议”一向是士人品评时政、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然在清代，朝廷严禁士人上书言事、结党清议，也不允许离职官僚干预地方政务。在此情况下，绅士欲表达政见，最便捷的门径恐怕就是入幕“佐治”。因为幕友虽在名份上是“佐官为治”，但常常“代官出治”。左宗棠居湖南巡抚张亮基幕下时，“批答咨奏，皆一人主之”。因此，清人有“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⑫之说。从清政府而言，不但禁止绅士入幕，反而定有录用才能卓异幕宾之例，即对入幕已达规定期限、才识兼优者，准令本官保荐，经过考核，给予职衔，分班录用^⑬。这必然刺激士人入幕的欲望。况且，在幕府，幕友还可以一边佐治，一边继续准备应试，不废举业。王杰、汪辉祖、陈銓等人中进士前，即曾游幕。

绅士入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僚体制的缺陷，提高了国家对其致力培育的“科举人才”的利用率，但也加强了绅权对官僚体制的辐射，并影响行政机器的运转。事实正是如此，由于幕友常常“代官出治”，案卷、公牒在上下级幕友之间呈报批答，结果在正式行政系统之外，又形成

错综复杂的幕友关系网。凭借这些关系网，幕友们彼此“联络声气，招揽事权”，或操纵幕友人选，或“玩弄本官于股掌之上”^⑤，作弊营私，高下其手。清政府虽一再明令禁止，但终不能奏效。

吏胥地位卑下，几同奴仆，然在整个行政系统中起着上传下达、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具体地处理着各种行政事务，权力甚重。史称“上自公卿，下至守令，总不能出此辈圈襍，刑名簿书出其手，典故宪令出其手，甚至于兵枢政要，迟速进退，无不出其手，一刻无此辈，则宰相亦束手矣”^⑥。因此，绅士虽然口称羞与吏胥为伍，甚而责之为“奸”、“猾”、“蠹”，然在地方活动时，因需要利用吏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力图将其控制在手中。主要控制方法如下：

其一，指派奴仆充当吏胥。江苏常熟大乡绅钱谦益等人曾主使奴仆邹月升、安如遇、周宽昌、刘时升、张永祚充当粮吏、库吏，致使“库银半归吏囊，半归官囊”^⑦。江苏太仓乡绅钱来琛之奴也入县为吏，“叶公宣系户房伪吏，官名陈昌信，又兼充承发伪吏，……系钱宦第一豪奴”，“陈朝麻系承发伪吏，钱宦豪奴，官权宦势，毒害万民”^⑧。田文镜在《抚豫宣化录》卷四中提及，乡绅“家奴半充吏役，遇事生风”之事实。

其二，下层绅士或绅士子弟亲自充当吏胥。吏胥虽然遭人贱视，然可利用职权牟取暴利。有人统计，州县每吏年收入约千两以上，每役也在千两左右^⑨。不少落泊生监，见出仕无望，便索性投身吏胥之列。顺治年间，朝廷发现“各省生员，闻有身列黉宫，现充书吏者”^⑩。一些缙绅子弟见充当吏胥“足以攫财货、快恩仇”，也相率为之。陈宏谋即说：“吏役中多有名家子弟，科举未就，托业公门”^⑪。

对吏胥来说，因自身社会地位低下，一般也乐于结交绅衿，投靠绅衿，以为政治依托。田文镜指出：河南有一班衙蠹“专意结交本地恶宦恶衿、白拉光棍，或代为比租追债，或奉命出票拿人，以得其欢心”^⑫。江苏太仓州衙役包祥甫、蒋荣光、顾君圣等人，即投身于大乡绅钱来琛、徐振绂门下，“酷吏蠹役，炼成一局”，仗势欺压乡民^⑬。如是，吏胥即为绅士所操纵，成为扩张绅权的工具。广东潮阳绅士“素有健通之癖”，县差官役一任其指挥，以至追比无方，钱粮拖欠日久。县令一气之下对县役“示之以严刑”，结果“各役哄堂一声，溃然走散，登东山石洞，二三百人蜂聚弗返”。县令无可奈何，只好“款绅衿，邀豪猾，出以好言相慰”，衙役才下山“供役如常”，自此县政“奄奄不能复振，百事皆掣肘不可为矣”^⑭。

4. 里甲、保甲组织 里甲、保甲是清王朝在基层社会建置的两大乡治组织。在职能上，二者虽有相互重迭之处，但前者大体为编审户籍、征派赋役而设，后者大体为缉盗平讼、布施教化而立。自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摊丁入亩、乾隆永停编审后，里甲的某些职能逐渐并归保甲，二者遂成混一情势。

里甲、保甲虽属官治机构，但并非国家正式行政单位；其执事不但不具有“官”的身份，相反处在“役”的位置上，人们一般不愿充任。“充此役者，非穷困无聊之徒，藉此以谋口食，则狡悍无赖之辈，假此以遂阴私”^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甲、保甲之执事虽然地位不高，但其职掌却与地方民生利弊息息相关。因此，绅士总是试图凌驾其上，予以操纵。按规定，绅士不能出任里甲、保甲长^⑯，但不少生监为了谋利，往往包当该职。在安庆，“小民视里役为畏途，而衿蠹势豪复为包揽充当。如包当一次，议贴银一二百两”^⑰。在杭嘉湖地区，“里长虽行禁革，而变为圩头、图总、甲首种种名色，甚且有衿监、吏胥暗占为缺者”^⑱。如果说绅士直接出任里、保甲执事尚属稀少，那么幕后操纵其人选则比较常见。按规定，里甲、保甲执事由“士民公举”产生。由于绅士为“一乡之望”，因而所谓“公举”，往往变成绅士“独举”。这些被举者自然要听命于绅

士。绅士对保甲长的操纵控制,驾空了保甲长的权力,使作为官治机构的里甲、保甲组织流于形式。从清政府而言,尽管力图将绅士置于保甲组织下,“绅士之家一体编次,听保甲稽查,如不编次者,照脱户律治罪”^⑧,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受到绅士的抵制,并始终保持超越保甲控制的状态。因此,一些地方官索性提出把绅士纳入保甲执事层的主张,让绅士总理保甲事务^⑨。朝廷是否采纳这种主张姑不具论,从实际情况看,在晚清绅士已俨然将保甲组织控制在手中。

5.流氓 绅士为“一乡之望”,流氓为社会“渣滓”,谈绅士而论流氓,似乎有些不伦不类,然观之清代社会,二者确实有某种干系。

清代流氓,种类繁多。有藉“暴力”为生者,如“打行”;有以架词唆讼为业者,如讼师;更有明为正当职业而暗行勒索之事者,如脚夫。但是,不管任何形式的流氓,其行为均有伤国计民生,不为王章国法所容。为了逃避官府惩治,他们往往投于势宦门下,寻求政治庇护。江宁巡抚余国柱指出:“打降之为害,……城镇乡村无处不有,藉拳棍为生涯,视善良如几肉……,倚靠势豪为城社,结连衙蠹为腹心。彼既恃有护身之符,尚何畏乎三尺之法?”^⑩江苏昆山徐打降势焰嚣张,许七、许二等杀人之后,自料“大辟难逃”,即“贿投昆山徐宦恶侄徐君甫,挟制县廉,不询致死根由”^⑪。脚夫也是如此。华亭县“脚夫土工,各有豪宦庇护,藉势霸持,到处皆然”^⑫;长洲县“罡头脚棍,贿投势庇,私分地段”^⑬;嘉定县脚夫“什佰成群,投托势要,……有司碍于情面,不加惩创,养成骄悍,日甚一日”^⑭;江湾镇脚夫“投托势宦,结纳豪奴,私自分疆划界”^⑮;金匱县脚夫更持有势宦给发的“灯牌”进行活动^⑯。

对绅士来说,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维护和谋求政治经济利益,也需借助流氓势力。徐宦家奴顾君甫企图吞占邻人亩产,“百计谋图不遂”,于是“埋伏打降二十众,各执金箍铁尺器械”,指喝画押,强行占据。松江宦孽高槎客等人,谋占邻人房产不遂,即“统众百众,列械层围,斩门抄燹”^⑰。福建地区,“山海交错,人稠地狭,产米无多”,势豪之家经常招纳打降,“争夺界址”^⑱。正因为流氓势力可以利用,因而绅士试图对其加以控制、渗透。概括地讲,绅士主要通过下述途径控制流氓群体。

一是亲自加入流氓集团。流氓集团自然以市井恶少、游手好闲之徒为主体,然而因参与流氓活动有利可图,所以不少下层绅士自思上进无望,便厕身其间。《亦巢偶记》载:“打行,……有上中下三等,上者即秀才贵介亦有之,中者为行业身家子弟,下者则游手负担里巷无赖耳”^⑲。余杭“天罡党”首领孙某,即出身秀才。此人“善于刀笔”,率领党徒,无所不为^⑳。尤其在讼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生监。史载:“凡刁猾地方,但有词讼,即有无赖衿棍包揽料理”^㉑;“江西讼棍最多,……此辈既能主唆作词,原系读书未就或厕身士林之人”^㉒。因此,时有“讼棍多系贡监文武生”之说。

二是主使或默许家奴加入流氓集团。在流氓集团中,不少流氓成员是绅士的家奴。如江苏太仓打降首领沈君甫、胡恩即是乡绅徐振绂的家奴;“白拉光棍”杨椿系昆山徐春元之仆^㉓。《太仓州志》载:“吾州恶习,多相殴,或倩无赖,曰打行;或倩若辈(家奴),曰宅里人。大约打行半系宅里人,则若辈尤雄”^㉔。

三是绅士子弟结交流氓团伙。不少纨绔子弟无所事事,勾结流氓无赖,肆行不法。《福惠全书》载:“近日吴越州邑,有等无赖少年,并纠合绅衿不肖子弟,焚香歃血,公请教师,学习拳棒,……狐群狗党,出入茶坊酒肆,蜂游蝶舞,颠狂红粉青楼。闻他人有不平,便指报仇而恣抢夺,忤伊凶手一盼,辄为攒殴而折股肱,号称太岁,名曰打降”^㉕。

四是绅士之家专门豢养无赖棍徒。直隶固安县监生王天佑,收养一班讼师、打降、豪仆,横

行乡里,道路侧目,兴灭词讼,挟诈人财,无所不为^⑧。南翔镇监生姚秉忠“为富不仁,专作包娼鸡奸幼童等事,因而豢养无赖,重给资财,以为打降”^⑨。徐乾学子侄、工部尚书翁叔元侄子、河南道邵登之子也豢养了不少打降。

正是通过上述途径,绅权向流氓渗透,流氓势力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绅士控制地方的工具。

此外,家奴、清客、门生、故吏等也是绅权向社会深层结构辐射的重要环节。这个以绅士为权力中心,以宗族等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为权力杠杆而构成的绅权体系虽然十分庞大,但基本由两个辐射区构成,即家庭辐射区和社会辐射区。在家庭辐射区内,以血缘、姻戚关系为纽带,连接着宗族、姻戚成员;以人身依附关系,连接着主子和奴才们;以契约关系为纽带,连接着东家和清客们。在社会辐射区内,以师生、同学关系为纽带,连接着宗师、门生、同年;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连接着同乡绅士;以互利关系为纽带,连接着绅士与州县官、幕友、吏胥、保甲、流氓等。而这些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又纵横交错,多向联络,形成一系列“亚关系”,从而使绅权权力结构更加复杂化。《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中有一段精彩的议论,正可谓是对绅权社会结构的绝妙说明:“有缙绅,则有缙绅之宗族姻戚,有缙绅,则有缙绅之门生清客,以及附势趋炎之土官猾吏,凭恃威灵,蝇营狗苟,相与生事害民,罔不吸精敲髓。于是,宗族姻戚,即缙绅之耳目也;狼仆打降,即缙绅之爪牙也;门生清客,土官猾吏,即缙绅之心腹羽翼也。嗟乎!乡党出一缙绅,不啻有数十百缙绅以为之助,而欲温饱之家,安其食息,宁可得乎?”^⑩

三、绅权的社会意义

行文至此,人们或许会问:作为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社会阶层,绅士出现在明清时期。那么,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绅权统治是否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呢?

首先,绅权的建立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强化。反观中国历史,中央集权的发展主要受两种力量制约,一是职业官僚系统,二是地方豪强势力。前者过分强大,必然削弱皇权;后者过分膨胀,必然削弱中央权力。然从历史发展趋势看,这两种制约力量是不断削弱的。就君臣关系而言,从秦汉到明清,二者曾经历了一个所谓“从共存到共治,降而为奴”^⑪的政治历程,皇权不断上升,臣权不断下坠。那么,官僚的政治地位为什么会从共存降而为奴,“一代不如一代”呢?原因就在于官僚社会背景的转变。宋代以前,官僚之所以能与皇帝共存、共治,是因为他们有“贵族”背景,保持较强的政治独立性。王亚南指出:从汉末到隋唐,中国官僚的一大政治特色就是贵族化色彩愈来愈浓厚,即在官员的继替中,门阀因素占主导作用,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贵族的世卿世禄现象^⑫。这些“贵族”化的官僚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对皇权保持较强的离心力,因而皇帝不得不与之共享治权,从而形成所谓共存、共治格局。宋代以后,随着门阀地主势力的瓦解、科举制度的发展,由皇权通过学校制、科举制、捐纳制等手段“做成”的绅士逐渐取代由门阀“生成”的“贵族”构成了官僚体系的主体。由于绅士一开始就对皇权有强烈的依赖性,因而官僚系统的地位必然下坠,皇权得以进一步膨胀。

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言,如前所述,古代中央政权很难直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自春秋战国起,基层社会长期由贵族把持,天子只是一种象征。秦统一中国后,虽然职业官僚取代贵族掌握地方治理权,但并不意味着贵族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汉末至隋唐,中国基层社会实际上由贵族化的豪强地主、门阀地主、士族地主控制。“就经济方面观

之,他们不但领有广大的土地,而且庇荫着多数的部曲,……对国家既不纳税,亦不当差。就社会方面言,他们从官位名地上造出血统优越传说,……既不肯与庶姓通婚,亦不肯与寒族交际应酬。就政治方面言,他们凭藉祖先的余荫,不但垄断官吏选举之权,……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高级长官亦由他们包揽独占”^①。这些集经济社会政治资源于一身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保持较强的离心力,因此隋唐以前,地方割据时有发生。绅士形成后,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均以皇权为依托,虽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但缺乏最终所有权;虽可以号令乡民,但不拥有自己的军队、司法机构;虽可凭借经济实力、文化实力打通仕途,但一般不可因血统而成为绅士。这也决定了绅士难以发展成为地方分权势力,中央权力随之得以扩张。

其次,绅权的建立将家族关系引向新的阶段。家族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秦朝建立后,宗法家族政治虽告结束,但大家族势力并未消声匿迹,从四至十世纪大约七百多年时间里,中国政治、社会舞台大约被三十个豪族独占^②。这种大家族与庶民家族既不通婚,也不应酬,构成两个界限分明的社会区域,在政治上一朝一野,在血缘上贵贱有别。后来,由于科举制的发展,士族势力渐次衰落,社会垂直接流动面放大,各家族均可能有人跻于绅士之列。于是,各家族发生裂变,形成贵贱分明的两极:“一极是贫困无告的人,另一极是那些已取得了上层身份的人”^③。但是这两极仍属同一家族,仍居同一社区,只不过是在家族中的位置不同罢了。这意味着家族内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形成一条血缘、地缘关系。这种情况直接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即绅士可凭借血缘地缘关系对农民实行更严密的控制,农民没有自己独立的社区。于是,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为温情脉脉的家族关系所掩盖,绅士与农民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与对立在一定程度上被血缘地缘情感抵销。

再次,绅士的形成将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在官府与民众之间建立了一种“缓冲”。在古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是相隔离的。这主要表现在以城市为据点发号施令的各级国家权力不能充分渗透到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数目众多的乡村社会。虽然从秦代开始国家就设立了乡、亭、里等基层组织形式,但其功能也仅限于税收和治安,并不意味着对基层社会生产、生活的有效组织治理。绅士的形成虽不能改变国家与社会隔离的传统格局,但以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充当了沟通上与下、官与民、城与乡的角色。一方面,国家需借助绅士的影响,促使农民与官府合作,充分发挥行政效能;另一方面,个体农民势单力薄、地位低下,往往需求绅士“保护”并与官府交涉。因此,绅士是介于官府与民众之间且双方均有所求的特殊阶层。这一角色减小了国家与社会的摩擦力,增强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弹性,为封建大一统社会带来了“安全”。

①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②④④⑤⑥⑦⑧⑨《清经世文编》卷七十四、二十三、二十三、十七、二十五、二十四、七十四。

③《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三,职役三。

④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⑤⑩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98页。

⑥汪辉祖:《佐治药言·戒己甚》。

⑦⑧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4—15页。

⑧⑨⑩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146、138、146页。

⑨⑩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9、54页。

⑩吴晗:《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

- ⑪⑬⑭⑮⑯⑰⑱⑲⑳《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
- ⑫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52页。
- ⑬Chang Chung - Li: 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 1962, P. 197.
- ⑮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17页。
- ⑰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 ⑱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3页。
- ⑲张仲礼：《中国绅士》导言。
- ⑳⑳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27页。
- ㉑《居官圭臬》上，“乡绅约”。
- ㉒同治《攸县志》卷三十九，《义行》。
- ㉓《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十一。
- ㉔⑳蓝鼎元：《鹿洲公案·山城门》。
- ㉕⑳《刑案汇览》卷九，卷十一。
- ㉖光绪《漕运全书》卷九。
- 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 ㉘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6页。
- ㉙陈春声：《论清末广东义仓的兴起》，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 ㉚⑳安东尼·M·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232页。
- ㉛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分店1991年版，第212页。
- ㉜⑬Hilary J. Beatlie: 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 A study of Tung cheng, Anhwei,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04, 105.
- ㉝《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一。
- ㉞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法律·命案”，3—42/2287—11。
- ㉟川胜守：《徐乾学兄弟及其时代》，载《东洋史研究》40—3，1981年。
- ㊱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8页。
- ㊲佐藤仁史：《清朝中期江南的一宗族与区域社会》，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
- ㊳⑳⑳《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3—444、435、434页。
- ㊴《山阳收租全案》，载《清史资料》第二辑。
- ㊵徐世昌：《续修徐氏家谱》下册。
- ㊶⑳李渔辑：《资治新书》初集，卷六。
- ㊷蒋良骥：《东华录》卷三十。
- ㊸雍正《朱批谕旨》第十函，第五册。
- ㊹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九，“杂志”。
- ㊺郑天挺：《清代的幕府》，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㊻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上，“乾隆五十年”。
- ㊼参见汪辉祖：《佐治药言·自处宜洁》，《儒林外史》第二回、三十六回。
- ㊽汪辉祖：《佐治药言·自处宜洁》。
- ㊾⑳⑳《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五、七十五、三八三。
- ㊿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七。
- ①《虞阳说苑》甲集，《张汉儒疏稿》。
- ②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载《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

- ⑦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三上。
- ⑧蓝鼎元：《鹿洲公案·五营兵食》。
- ⑨徐栋辑：《保甲书辑要》卷三，《广存》。
- ⑩参见黄强：《中国保甲实验新编》，正中书局 1936 年版，第 137 页。
- ⑪康熙《安庆府志》卷五。
- ⑫雍正《朱批谕旨》第八函，第一册。
- ⑬《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四，“职役五”。
- ⑭康熙《江南通志》卷六十五，“艺文”。
- ⑮⑯《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521、525 页。
- ⑰民国《江湾县志》卷三，“徭役”。
- ⑱雍正《朱批谕旨》第九函，第三册。
- ⑲褚人获：《坚瓠集》九集，卷二。
- ⑳㉑《治安文献》二集，卷六。
- ㉒⑳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
- ㉓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十二。
- ㉔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
- ㉕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三函，第四册。
- ㉖㉗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4、4 页。
- ㉘㉙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81 年版，第 82—83 页。

293, 293, 293, 293, 293, 293, 293, 293, 293

(上接第 21 页)

- 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33页《创建豫章会馆劝疏碑》。
⑩⑪《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128页《重修天后列圣碑》。
⑫宴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正中书局1946年版。
⑬《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128页《重修天后列圣碑》。
⑭民国《金堂县志》卷四《礼俗》。